

学海星光

人生掠影

创造引领学术发展的奇迹

刘宁



傅璇琮先生

看到二十四册《傅璇琮文集》出版，我感到非常激动。傅璇琮先生是引领学术的规划者与设计师，对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部《傅璇琮文集》展示了傅先生精湛的学术成就，也相当全面地呈现了他奖掖后学、推动学术所付出的心血，尤其是首次集结的十册《骈草集》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以更好体会傅先生孜孜不倦奉献学术的勤勉与热忱。相信这部文集的出版，会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理解这位学术大师。

傅先生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有非常独特的地位，他自觉以现代学科意识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现代学术体制之下的古代文学研究，需要通过“学科化”的方式来推进，这与中国传统学术多有不同；但“学科化”可以增强研究规范，加强学术协作，促进有效的学术积累，推动研究创新。研究生教育是现代学术“学科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虽然从20世纪初即开始，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生教育全面繁荣之后，才真正全面走上“学科化”的发展之路。21世纪以来，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趋丰富，“学科化”的发展要求也更为强烈。

傅先生在推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化”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他积极树立研究范式、热情培养研究队伍、深入总结研究规范，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汗水。受傅先生影响最深的唐代文学研究，走在古典文学“学科化”发展的前列，而傅先生许多“学科化”建设的努力，其影响又远远超出唐代文学，推动了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现代研究。他本人也成为深受尊敬的学术宗师。

树立科学的研究范式，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傅先生对研究范式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40多年的唐代文学研究，会发现有两种研究范式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唐代文学与唐代社会的关系研究，二是唐代文学史演进研究。傅璇琮先生的《唐代文学史》是第一个范式的垂范之作。学界围绕这一范式，展开了对科举、入幕、地域、家族、宗教等因素与文学之关系的全面探讨，许多研究都受到傅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直接指导。

唐代文学史演进研究是另一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这类研究以诗风与诗风、文风的关联为核心，综合群体研究、文体研究以及对外部成因的细致考察，对文学史演变的环节、过程，进行新的观察，以期丰富对唐代文学史面貌的认识。

识。对这一范式，傅先生也多有贡献，他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希望揭示文学的演进过程，而《翰林学士传论》等著作也在深化这一研究所需要的群体分析。

上述两个范式，都以文献的深入考辨为基础，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及其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等对唐代文学的基础文献，进行了扎实的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深厚文献基础。

对学科发展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都是科学而开放的。唐代文学研究上述两个范式，使文学、文献、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有机结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研究结构，可以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它们推动唐代文学研究整合多种要素，形成充分的学术交流，积极深化对唐代文学的认识。傅先生之所以被学界誉为学术规划师，主要是因为他对上述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的研究范式，或创构垂范、或积极推动，其充满智慧的规划引领，对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贡献甚深。

培养研究队伍是“学科化”发展的要务。傅先生对培养青年学者倾注了很多心血。他不遗余力地奖掖后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年轻的学者不断深造、勇于探索。他去世后，人们感念他对青年后学的热忱，回忆起古人“八百孤寒齐下泪”的诗句。这是深切的缅怀，更是崇高的赞誉。此外，各种学术组织的建设，是培养研究队伍，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傅先生对此也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长期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做了大量的组织引领工作。此外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王维研究会、韩愈研究会等的建设，也得到他的许多关心支持。

总结学术规范，是“学科化”科学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这也是傅先生非常关注的工作。他与蒋寅共同承担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组织了全国近60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4年，形成了300多万字的成果。“此书的编纂，是为了克服‘课题重复、规范缺失、出版无序’的问题，推动学术的良性发展”“是多角度地宏观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整体，对学界乃至全社会都产生广泛影响。他非常关注中外学术交流，早在1991年就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传播与研究》，显示出全球视野和前瞻的眼光。此后他在引介国外学术成果、关注海外汉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傅先生长期在出版界工作，所提携奖掖的无数学者，与其并无体制内的师承关系，避免了门户的狭隘。有人会觉得这是他身在出版界的独特身份所带来的影响，但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傅先生在承担着繁

重出版编辑任务的同时，积极奖掖学者，推动学术，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这是巨大的学术责任感，也是开放的胸怀。正是这样的责任感与胸怀，令傅先生在积极创建现代学科化研究的同时，避免了知识与人事的种种壁垒，呈现出开放的格局，有“学科化”之长而无其“门户”之短。这是傅先生创造的奇迹，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奇迹。

我作为一名唐宋文学研究者，学术之路上一直得到傅先生的关心和鼓励。读书时参与《全宋诗》的整理，傅先生作为《全宋诗》的第一主编，曾给予我们悉心指导。我在葛晓音先生指导下完成研究晚唐五代诗歌的博士学位论文。傅先生与蒋寅老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时，让我撰写其中“唐代文学卷”的“晚唐五代诗歌”一节，给我很大鼓励。我翻译了美国著名学者包弼德教授的专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呈送傅先生后，得到他的热情肯定。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韩愈的有关问题。傅先生对韩愈研究的大力倡导，令我深受鼓舞。这点点滴滴，都让我对傅先生的学术贡献，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今天回顾傅先生的卓越成就特别是他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现代学术之路上的不断发展的种种努力，崇敬的同时，很多人会有如此奇迹难以重复的感叹。其实，真正的创新创造都是不可重复的，但是，透过傅先生的奇迹，可以看到现代学术如何建立更良性的发展，如何超越“学科化”所能产生的狭隘与拘束。在这一点上，傅先生对待学术鞠躬尽瘁的责任感、开放包容的胸怀，有着无尽的启迪意义，这或许是让现代学术避免狭隘与壁垒，真正获得长远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言：打开与古代先贤对话的大门

本报记者 杨雪

莫言首部诗集、书法集《三歌行》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

2019年，莫言与友人王振有机会一睹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真迹，感触颇多，并创作长歌。自此，莫言行走大江南北，怀抱壮志远游，遍访人文胜景，创作大量古体诗词与书法作品，打开与古代先贤对话的大门。《三歌行》便是在中华大地、异域山川的游历之歌，是岁月长河的生命之歌，也是民族气魄、大同胸襟的境界之歌。

三首长诗灵感都源自旅行，但后期都经过了漫长的思考与修改，如在山西壶口瀑布有感而发的《黄河谣》，是多年后才创作完成、致敬母亲河的长诗，诞生、诉情怀，从借神话人物到谈及现实，看

似写黄河，实则是借此论天地与沧海，莫言更是在最后发出“两游黄河思绪万千不吐不快”的感慨。

在《三歌行》新书论坛上，莫言分享说，不同于鲁迅那一代学贯中西的文人，当代人在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方面是相当欠缺的。“我们只能通过勤奋学习来补上这一课。我到了这个年龄，如果想在创作上有变化，有新的起色，转变也许是一条途径。”

“我是‘半路出家’，50岁才开始练书法，临帖的过程就是用别人的规范努力地校正自己的习气。这是临碑帖的重要意义。”莫言鼓励年轻人能够拿起毛笔写作，“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写，重新按照旧有的诗词格律来填写诗词，是向先贤和传统致敬的一种方式，也是现代人理解古人的一个通道。”

陈尚君：在文学研究中看到鲜活的“人”

本报记者 谢颖

对于唐朝诗坛的璀璨群星，读者也许熟悉其险峻人口的诗作，但对他们隐没在历史风尘中的人生历程知之甚少。事实上，每位诗人都拥有着自己卓尔不凡的性格禀赋与独特鲜活的浩瀚人生。但除了为数不多的诗坛巨擘有翔实的传记记载，其余大量的唐朝诗人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想要理解其精华，必须对其生命历程进行“全景式检索”和“沉浸式重访”。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所著《我认识的唐朝诗人》，便为读者做了这样繁杂而庞大的文献“打捞”工作。

陈尚君表示，在文学研究生涯中，他始终坚持“文学就是人学”的观点，如果在文学研究中看不到一个个鲜活的“人”，读不懂他的内心，不能理解他的欢喜与痛苦，与研究对象总是有隔膜的。

谈及创作这本书的学术依据，陈尚君说，一是对唐诗基本文献的长期研读与考证；二是文史融通的立场，文学研究需要在每位诗人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透视其作品与人生问题；三是受导师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念影响，主张作者要对传主抱有同情的理解，正确地理解传主在彼时彼地的真实处境与面临问题。

《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是陈尚君对撰写的具有学术意义的大众科普图书的一次尝试，在内容审定上乘承着细致严谨的态度，同时也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能力，行文时尽可能采用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

在陈尚君看来，这本书最主要

的就是讲述了每位唐代诗人的真实情况，他们在一生中经历了哪些事件，遇到过怎样的挫折，在困境中如何奋发图强，以及如何在作品中传达他们的心声。每位诗人都从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不能将其作品从时代中抽离出来孤立看待。

陈尚君说，在文学研究生涯中，他始终坚持“文学就是人学”的观点，如果在文学研究中看不到一个个鲜活的“人”，读不懂他的内心，不能理解他的欢喜与痛苦，与研究对象总是有隔膜的。

谈及创作这本书的学术依据，陈尚君说，一是对唐诗基本文献的长期研读与考证；二是文史融通的立场，文学研究需要在每位诗人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透视其作品与人生问题；三是受导师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念影响，主张作者要对传主抱有同情的理解，正确地理解传主在彼时彼地的真实处境与面临问题。

张清华：探寻时间的美学

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新作《时间的美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张清华从“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及评价纷争问题”“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当代诗歌中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观察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视角”等议题展开叙述，对莫言、余华、苏童、食指、海子等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精当、恰如其分的评析，言他人所未言，角度独到、内容深刻，是一部值得细读的文学评论作品集。

张清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一个不幸的狂人家族，一个知识者的谱系，从鲁迅的第一篇白

话小说开始，就开始了它的繁衍。这个谱系在过去似乎已经被梳理过，但还远远不够。没有人将它们联系起来看，更没有人将现实中的和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看成同一个群体。因为如果不能获得一个整体性眼光的话，将无法得出有启示意义的结论。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毕飞宇评价道：“张清华的批评文本太接近诗了，也可以说，只有写诗的人才会写出那样的独特的表达。诗是无所不能的，它具有无所不能的概括能力。让我们来看看张清华是如何‘概括’莫言和余华的，他说，莫言的‘加法’和余华的‘减法’。莫言与余华，多么复杂的两位天才，而张清华仅仅依靠‘加法’和‘减法’这两个算术定义就把他们给‘拎’起来了。”

罗锦麟：写意与写实歌舞剧互补双赢

本报记者 郭海瑾

音乐剧作为一个戏剧的、娱乐的、美学的、哲学的和产工业的研究领域，正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锦麟认为，囿于“音乐剧是舶来品”这一习见的束缚，学术界一直没有重视对于中国音乐剧思想渊源流变、艺术形态演化、剧目发展脉络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

“音乐剧不应只称欧美，艺术史表明，与时俱进，与地俱变，充满着口语方言杂音的歌舞剧普遍存在。”罗锦麟认为，王国维揭示的“以歌舞演故事”这个概念，揭示出中国国内的戏曲与歌舞剧实为一脉相承，并且，国外音乐剧和中国的戏曲、歌舞剧在艺术形态上是殊途同归的。

罗锦麟曾运用中国戏曲的形式导演了几部古希腊悲剧，探索东西方戏剧的融合，成功地在海外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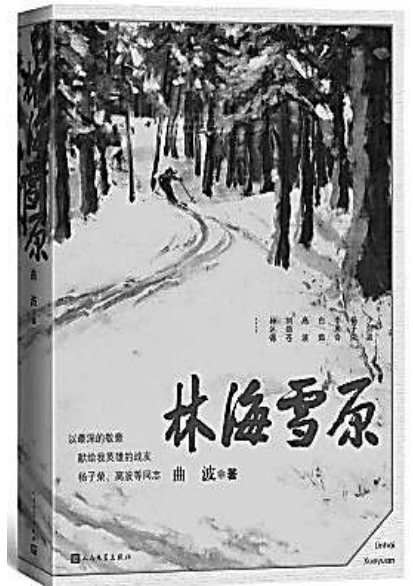
各种戏剧节和访问演出，总场次超过300多场，受到东西方观众和专家的好评。在罗锦麟看来，这是因为中国戏曲歌舞剧、虚拟、象征和写意的美学及艺术特色打开了他们的观赏世界。其中《美狄亚》一剧在北京演出时，正值俄罗斯戏剧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下飞机的当晚观看此剧后，一致认为“这就是中国的音乐剧”。

罗锦麟认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艺术与“音乐剧”有许多相同之处，写实美学与写意美学的歌舞剧乃中国音乐剧双胞胎，美学风格不同，各有千秋，相互借势互补双赢。



不仅是一本书和一个名字

杨柳



《林海雪原》自1957年问世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之一，今年是它的首次出版一百周年诞辰。由于工作关系，曲波和《林海雪原》对我来说已不仅是一本书和一个印在封面上的遥远的名字，而是几十年有温度的日子。

知道曲波

少不更事，看一本大厚书，少剑波、杨子荣、小白鸽。那时候的一号人物不是杨子荣，是少剑波，心目中的帅。听大人们说，少剑波其实就是曲波，小白鸽就是曲波的爱人。后来有了电影《林海雪原》，看了很多遍，少、杨、白的形象在心目中落实了，少剑波就是张勇手，杨子荣就是王润身。后来《北京晚报》连载《山呼海啸》，每天一小块，我还记得那版的样子。现在回想，“山呼海啸”四个字应该是刘波阿姨写的（“林海雪原”四个字就是她写的），她的字很棒，大气舒爽，书法范儿。

曲波和《林海雪原》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如时所说“神一般的存在”。前两年，一个中年的远房亲戚知道我认识曲波，简直不敢相信：“曲波？是《林海雪原》那个曲波吗？”真是那个曲波啊？“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她很激动，就一定要请我吃饭。虽然至今未请，能借到曲波之光，我已满足。”

《林海雪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业余作者曲波抱着一包袱手写的书稿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冥冥中的缘分。关于《林海雪原》的出版，有很多故事。曲波是一个军人，但他心里有文学的根，自幼读书，对宇宙间充满了想

各种不合规的印刷行为，明确了《林海雪原》在人文社的专有出版权，同时理清了《林海雪原》首次出版以来人文社全部版本、印次、印数以及租型印刷的数据。直到今天，虽然刘波阿姨已不能理事，但是女儿鑫鑫，包括第三代的小叶，继续看守、维护着《林海雪原》出版权，除人文社，“来者必拒”，他们是维护版权的好榜样。

百万庄辰四楼

记得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接手前辈的工作，做了《林海雪原》的编辑，见到了“少剑波和小白鸽”。百万庄辰四楼，院门常锁，小扣扉扉久不开，没有手机的年代，联络基本靠喊，或者趁有人进出时蹭进门去。房子很小，现在很难想象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如何生活在这套房子里。前些年鑫鑫把这个房子装修一番，与之前判若两房，可惜只有刘波阿姨独享了。

曲波话慢，不多——也许并不少，但是被刘波阿姨快人快语覆盖了。她多次对我历数曲波的优柔寡断，反衬自己的快刀乱麻。她告诉我他们当年如何恋爱，有情人如何成了眷属；曲波写《林海雪原》时，她如何在纷杂的家里给他创造安静的环境；完稿之后，她如何在下班之后，安排好孩子、家务，帮曲波抄稿，最后用毛线把稿子订成册，两人一起送到人文社。可是最近发现，《林海雪原》的稿纸是用毛线订的不假，可稿纸上的字并不是清秀有范儿的刘体，而是伸胳膊伸腿儿的曲体。是不是另有一版刘体抄本，不得而知。中国现代文学馆落

成之时，从人文社征集了很多宝贵的原稿。还记得我们从老式书柜里掏出一本本发黄的原稿的情形，可惜那时没能甄别一下毛线订的《林海雪原》的书法。

他们伉俪二人实在是一对互补的组合——她有她，他心里踏实；有他，她心满意足——这是当年一个还算年轻的编辑的观察。

曲波全集

2010年以后编《曲波全集》，对曲波有了更多更实在的了解。曲波一辈子都是业余作家，他所有的创作都跟他的经历和生活相关。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在和刘波阿姨一起收集整理作品、照片的过程中，又听她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他们在战争的、和平的年代里，对工作、对生活、对家庭、对朋友诚恳、热情，面对曲折坎坷、名利得失，又是一派泰然、淡然。那时曲波已去世近90年，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刘波阿姨年近90岁，依然乐观爽朗，坚强独立，对自己的一生、自己的老伴和孩子们非常满意，非常满足。正直、善良、坚强，是他们二位给我的深刻印象。最后一次见到曲波，是在人民医院的病房，他还有刘波阿姨，微笑着和我们合了影。

曲波是一个戎马倥偬、意志坚定的军人，又是一个深藏浪漫情怀、与人为善的“文艺青年”，还是一个舐犊情深的父亲。我读到20世纪70年代他写给鑫鑫和鑫鑫的诗，他在那个时代对成长中的孩子的关爱和引导，让我心生感慨。曲家四个儿女，都是和新中国一起长大的，他们从辰四楼走向世界，今天又回到这里，为父亲而相聚，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林海雪原》永在。怀念曲波，祝福刘波阿姨。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